

南谷類稿

蒋逸雪
齐鲁书社



南谷類稿

卷一

南谷类稿

蒋逸雪著

齐鲁书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南谷类稿

蒋逸雪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1.25印张 2插页 251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书号 11206·128 定价 2.75 元

目 录

经今古文学述评·····	1
商代迁都考·····	55
殷商拓地朝鲜考·····	66
《心史》辨伪·····	75
敦煌考古纪程·····	82
数字探源·····	100
释四方·····	108
释蚕·····	112
谈有关桐城文派的几个问题·····	115
论阳湖文派·····	135
论秦始皇焚书坑儒·····	206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时代问题·····	223
替曹操恢复名誉要恰如其分·····	234
关于鲁迅校勘《嵇康集》的几点臆测·····	247
谈有关《阿房宫赋》的几个问题·····	255
谈《醉翁亭记》一文用“也”字·····	264
陆游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二记无碍晚节辨·····	269
王勃作《滕王阁序》之年·····	284

史可法《复多尔袞书》的作者问题·····	285
刘师培之死·····	287
张謇拟传·····	288
唐大圆先生行述·····	292
《平乐印庐稽古文字》序·····	294
《炎黄氏族文化考》序·····	296
夏君佩白哀辞·····	298
祭吴克谦医师文·····	301
读诗偶记·····	302
南谷诗存·····	325
《南谷类稿》后记·····李 坦	357

经今古文学述评

第一章 释 经

我国历史悠久，书籍浩如烟海，分门别类，经学其一端也。考经之得名，颇为曲奥，《说文解字》：“经，织从（纵）丝也，从系，丕声。”纵线为经，横线为纬，织者必以立经为先。经以丕为声，声亦兼意，丕为水脉，隐寓蕴藏无尽、条理不紊之义。古者简策二字往往连文，孔颖达云：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见《左传疏》）按策亦通册，册篆文作,即肖其形。古初书籍赖编束之，犹布帛之有资于经纬而织成也。故借经为书籍之名，近人以“线装书”释经，非无因也。其后，经又为某种书籍之专称，且特具崇敬之意，比如宫字本为一般居所之名，后有所谓宫殿者出，则普通房舍须避原称，同一例也。世之释经者，或解为道，或解为法，或解为常，或解为径，说虽繁多，但悉出后起，非始义也。

《礼记》有《经解篇》，说者谓经名所自始。《经解》引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篇名《经解》，而

孔子口中实未有经字。“《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吾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斯称经之最早者矣。秦人燔书，《乐经》失传，于是又有五经之目；五经合《周礼》、《乐记》又称七经；更有将《春秋》分为《公》、《谷》、《左》三传者，于是九经之名以起；末又益以《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而称十三经。宋人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子书》，亦隶于经之范畴云。

经学仅占学术之一部门，但过去其地位崇高，远在其他书籍之上。自来目录学家著录，分别部居，如刘歆《七略》，阮孝绪《七录》，王俭《七志》，荀勗《四部》，以及唐以后之《四库》，分类或七或四，而无不以经冠其首焉。

第二章 经有今文、古文之别

经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别？秦焚书禁学，汉兴，收拾烬余，加以理董；或凭老师宿儒记忆，写以当时通行之字，孔颖达所谓“以隶者可识”（《书序疏》）也，故称今文本。山岩屋壁，间出旧籍，乃前人所写藏者，字体为蝌蚪或籀书，故称古文本。此今、古之名所由起也。

至今文、古文所以分为两派者，其关键则别有所在，此竟为前代学者所罕言。鄙人垂老无成，何敢妄有论列，徒以事涉学术渊源，且政趋治理，百废俱兴，安容缄默，姑就积年体会一略言之。姬周一代，对文化著大功绩者，有两人焉：一为西周之周公，一为东周之孔子。周公监于二代，斟酌损益，更定

礼制，文物粲然大备，故《史记》谓其“愤发文德，天下和之”也。（《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是并崇周与孔也。孔子亦尝有追慕周公之言，若论影响深远，孔子殆度越周公。六国时，儒已成为显学，迨汉武纳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专崇儒术，于是孔子学说几掩盖一切，而成独尊之势，绵延达两千年之久，可不深究其故欤！古者官师合一，自孔子开私人讲学之局，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或入仕途，或事教授，如仲由之仕于卫，宰予之仕于齐，卜商之设教西河，澹台明灭之播学江左，此尤显著者也。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诸经本为中国古代学术之精粹，复经孔子之裁定润色。其亲承指授者，则拳拳服膺，唯恐或失。孟子曾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师师相续，辗转流传，故汉代今文家特重师承，崇尚口授，于是孔子成今文学派之宗师矣。然周公遗教，民间犹有传者，以为口说无凭，终不若竹帛之有据，于是周公成古文学派之鼻祖矣。此今、古分疆之主要原因也。

今文家论学尚义，古文家论学重事；今文家以事为粗迹，古文家譬义为空文。孟子有言：“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今文派尚义之显证也。古文派则无徵不信，实事求是。故今文派在标经，而古文派实近史，此今、古分疆之又一原因也。

二者趋向不同，所循殊轨：今文家专尚微言大义，发挥义理，固有精湛之言，亦多迂怪之说；古文家偏重名物训诂，语

必有徵，然委琐而遗大体者，间亦有之。二者互有短长，各具得失，斯在学者综观而善择矣。

第三章 经今古文学之争，系学术问题， 抑政治问题

荀悦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按谓说经者），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真本说。仲尼邈而靡质，先师没而无闻，将谁使折之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见《申鉴·时事篇》）荀氏生于汉末，亲见今古两家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故慨乎言之也。然荀氏于今古两派源头未能全部探明，盖彼误以孔子统摄古今，竟不知古宗周公，孔子仅为今文家所专主耳。昔人论学，往往周、孔并举，但周自为周，孔自为孔，二者诚有交光互映之处，但各具特点，不宜混同。周公制礼作乐，为周初创建文化之伟人；孔子删定修赞，为周末整理经籍之巨擘。周、孔皆有功于文化，而施为不尽相同。古者政教合一，周公以摄政之尊，其说为官学；孔子以布衣述作，专恃门徒流播，其说为私学。及至于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今文也，于是私学变为官学；而周之所谓官学，西汉仅流传于民间，以其与今文异趣也，而降为私学。汉与周适成倒置。周之官学，汉古文家之前身也；周之私学，汉今文家之大本也。源头不同，流派各异，相互竞立，歧中有歧。何休解《公羊》，斥治古学为俗儒；杜预注《左传》，谓仲尼从周公之志。既存门户之见，难免不高下随心。司马子长既闻经义于董仲舒，复从孔安国问故，兼通今古两家之说，曾云：“不离古

文者近是。”又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持论前后颇不一致，盖其时其势使之然也。汉武当位，学术定于一尊，太史执笔，岂容与政令相左！洞明真相，则不惑于字词间矣。

西汉为今文全盛时期，哀帝时，刘歆请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左氏春秋》于学官，博士诸儒悉反其议，盖歆所欲建立之书，皆古文也。歆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辞极峻切，拥护今文之光禄大夫龚胜忿而以去就争，大司空师丹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情势汹汹，歆乃自请补外。歆为汉之宗室，王莽崇信古文，歆不借屈身事之，为其国师，受封为嘉信公。歆虽位高势盛，公孙禄指歆“颠倒五经，毁灭师法”，请诛之以谢天下。可见今、古相争之剧烈矣！东汉以后，虽维持今文传统，然古文寝盛，势已不可遏抑。光武时，尚书令韩歆奏请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博士范升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又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陈元又与升争论。光武卒立《左氏》学，以李封为博士，公卿譁然。会封卒，《左氏》复废。章帝时，贾逵条奏《左氏》之长，而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旋又争辩于白虎观。桓、灵之际，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诂》，复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申《公羊》而难二传，郑玄作《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以批驳之。今、古之争，断断未已。此汉代学术史上长期难决之公案也。

学术聚讼，往往牵连政治。汉当立国之初，与儒殊为疏远，高祖恶见著儒服者，甚且抛儒冠而溺之。叔孙通与鲁儒生

为订朝仪，殿廷秩序赖以稍定，其后，高祖以太牢祀孔子。惠帝主政日浅，文帝好黄老，景帝尚申、韩，武帝任法，而常引经训以资点缀，立《五经》博士，大扬儒风，非有癖好，盖鉴于汉家往事，迫之使然也。景帝之世，七国为乱，一度有分崩离析，藩属割据之忧，而《春秋公羊传》开宗明义即讲“大一统”；匈奴久为边患，既有白登之围，复有漠后之书，《公羊》讲“复九世之仇”。斯皆触动武帝心事，而《公羊》遂成汉室佐治之工具矣。《公羊》乃今文最特出之书也，汉惯以《公羊》折狱，喜以经义饰吏治，有背其道者，非所能忍也。河间献王刘德，与武帝为兄弟行，而论学则与武帝异趣，独好古文经传。《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河间云：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_{（进也）}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官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得书多，与汉朝等”，又“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复以区区藩国，竟为《毛诗》、《左氏传》立博士，显然贰于朝廷矣。杜业，西汉人也，曾云：

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

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皤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引）

二人以骨肉之亲，徒以今、古之好恶不同，武帝横生疑忌，竟置河间于死地，此岂仅学术之争，实乃政治上之迫害也。

西汉今、古之争，今文居压倒之势，东汉今、古之争，呈平分之势，异军苍头突起，则有讖纬，以讖说经，经学蒙羞矣。古之方士，权奇自惠，所言虽不中绳墨，而他家或有取焉。方士渗入道家而符箓出，渗入儒家而讖纬出。“纬”与“经”对文，说者谓有经必有纬，于是因有六经六纬之名。《庄子·天道》：“于是繙六经以说。”陆氏《释文》：“《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讖近预言，其起又晚于纬。汉自哀、平以后，讖纬渐行，经师或加徵引。光武中兴，曾藉讖力，因亦笃信不疑，名讖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不惟喧宾夺主，亦且后来居上。《后汉书·郑兴传》：“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讖。’帝怒曰：‘卿之不为讖，非之耶？’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同书《儒林传》：“帝以敏（尹敏）博通经纪，令校图讖。敏对曰：‘讖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同书《桓谭传》：“是时帝方信讖，多以决定嫌疑，谭上疏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以欺惑贪邪，诳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

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帝省奏，愈不悦。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讖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讖。’帝问其故，谭复言讖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综观以上三节，知光武迷惑讖记为何如。郑兴议讖而仅免，尹敏议讖而终身沉滞，桓谭议讖则外谪而道死。盖光武之起，标榜高祖九世孙继汉，示天下以名正言顺，更师陈胜篝火狐鸣之故技，既有“刘氏复起”之谣，又传“白水真人”之谚，以此为精神支柱，其视讖为瓊宝，无足怪也。讖与经原不相容，而竟强经以就讖，斯乃经学之厄运，其为政治迫害，视西汉又加等矣。

学术影响政治，政治指导学术，两者息息相通，汉代经学足证其事。《公羊》立说，恰符武帝需要，《公羊》今文也，故西汉今文为特显。光武好讖，讖本野言，而东汉经师多以引讖为贵，一成风尚，难以究诘。《左氏春秋》体例不同二传，而又师承不明，以是久久不得立。章帝时，贾逵奏曰：“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李贤云：“春秋晋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为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范会自秦还晋，其处者为刘氏。’”按此分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文公十三年。隋刘焯谓：“《左氏》称在夏为陶唐氏，其处者为刘氏，非鲁史本文，乃汉儒欲其传，特为此语，以汉出尧后，独《左氏》为有明文，以此求重于世。”唐孔颖达亦云：“传说处秦为刘氏，未知何意言此，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汉室初兴，捐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

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刘孔二氏，异口同声，所见不谋而合，异哉！盖古文于汉，久处落莫，其经师乃异想天开，篡改传文，假托圣哲之裔，空颂朝廷之德，冀博宠信，取代今文。诡计纵售，文德何存！汉代今、古之争，自来视为学术论难，今观武帝之于河间献王，光武之于桓谭、尹敏，以及经师之作伪篡易，是属于学术问题者少，而属于政治问题者多也。聊贡所疑，有待论定。

附：论 讖 纬

刘氏《七略》，于讖纬不加著录，示尊经也。荀爽因谓讖纬起于哀、平以后，则非然也。“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皆见于《史记·秦始皇本记》，非讖纬之言耶？愚以为纬为经余，间混入方士之说，故纯驳互见，未可一概弃置。“日之为言实也，月之为言阙也。”“土之为言吐也。”皆见于《春秋元命苞》，而许慎《说文解字》征引之。《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孔疏：“此《易·系辞》文也。”按《易坤灵图》云：“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君子必谨其始。”作《经解》者实就“易纬”之文加以节次，《系辞》中何尝有此语耶？“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者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荡，故救荡莫若忠。”语见《春秋元命苞》，虽有蹈袭循环论之嫌，然亦略能说明三代损益之故。故子长著史，康成注经，间徵其言，不尽废也。张衡虽疏斥图纬，但其《思元赋》有云：“羸蹇讖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予夺各半，足证当时习染之深矣。

然纬书未始无袄妄之言，如：“下有谋则星入月，诸侯谋叛则月生爪牙，后族专政则日月并照。”“贪扰生蝗。”（并见《春秋考异邮》）“火从井出，有贤士从民起。”（见《春秋潜潭巴》）“霹雳击于宫殿者，妃后争政。”（见《春秋合诚图》）物理事情，了无系属，直呖语耳。欧阳永叔《乞校正五经劄子》欲全削注疏中讖纬之文，非无因也。

讖近预言，多出黠者造作，更不足信。新莽、光武，布政任人，一依图讖，世所共知，毋庸申说。《汉书·五行志》：“昭帝时，上林苑中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宁非霍氏作成之圈套耶？观尹敏之“君无口，为汉辅”，不难洞察此中底细。

总之，讖与纬本属两事，有时讖竟混入于纬。纬亦间具独到之见，经中葛藤，得其片言立解。然方士悠谬之谈增附不少，要在学者深思而明辨之。

第四章 汉代今古文学发展之经过

学术为政治服务，政治助学术发展，经今文派之在西汉，所以能如日中天者，自不外是也。

汉廷选择学术道路，有一摸索过程。高祖初起，戏侮儒生，既定天下，陆贾为陈《诗》、《书》，骂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但同起诸豪，称尔道汝，朝会喧阗，拔剑砍柱，草莽之习未除也。迨叔孙通与鲁诸生为定朝仪，庙堂之上，乃稍具规格。其后过鲁，以太牢祀孔子，盖有所感而然也。惠帝日短，文帝稍稍近儒，但鉴于兵戈之后，生计艰辛，一意与民休息，多采黄老以为治。景帝亦知近儒，

惟鉴于藩国坐大，不得不任用申、韩。至于武帝，立国已六七十年，休养生息，元气大充，可以有为。先是，匈奴频寇边境，嫚侮及于君后。武帝闻《公羊》经师阐述“大一统”、“复九世仇”诸义，乃大张挞伐，攘夷拓边，中国疆域赖以粗定。武帝既崇儒术，因立五经博士，广设弟子员。公孙弘治《春秋》杂说，以为丞相，封平津侯，创白衣公卿之局。然禄利之途既开，经训固臻密致，而傅会穿凿，曲学阿谀之辈，亦乘时以起。董仲舒号为醇儒，亦复瑕瑜互见，他可知矣。

今文家有所谓“微言大义”，微言，“隐微不显之言”也（《汉书》注引李奇说）。《汉书·艺文志》：“《春秋》所贬损大人当时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李、班所言，正复相应。大义本于微言，即其旨而引申之。微言发自先师，大义出诸后学。班《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殆即斯义。孔子修订《六经》，事秘旨奥者则口授弟子，师师相传，久乃著之竹帛，故说经者须标其所自，远溯尼山，始足取信，是谓“师承”，此今文家命脉之所寄也。

《六经》排列，今、古不同：《易》、《书》、《诗》、《礼》、《乐》、《春秋》，古文家之排列法也，《汉书·儒林传》以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今文家之排列法也，《史记·儒林传》以之。盖孟坚崇尚古文，子长虽今、古兼治，实以今文为主，于此可以觇马、班之各有好尚矣。古文家以书籍时代先后为序，今文家以程度浅深为准。孔门教人，最恶躐等，普通讲授，限于《诗》、《书》、《礼》、《乐》；若《易》与《春秋》，非高材不得闻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